

体大思精 雅俗共赏

——读陈雍先生新著《考古何为》

许永杰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一部陈雍先生的考古学专著《考古何为》。接到电子版粗读后,在微信上回陈先生八个字:体大思精,雅俗共赏。

《考古何为》(下文简称《何为》)全书共有8章,分别为“考古学”“田野考古学”“考古学理论结构”(包括考古学年代学、层位学、类型学、阐释学四种方法论)“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考古学文献”“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用考古”。

《何为》“开头的讲”讲:“《考古何为》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用‘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来概括。”这让我们想到俞伟超先生1996年曾写过一本《考古学是什么》的书,收录俞先生有关论述和对话16篇,内容主要有考古学理论及演进,考古学基本方法论——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文物学、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目的和作用,以及“新考古学”等。俞先生的著作不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如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王铭铨《人类学是什么》等19部),后者是出版社专门组织相关学者撰写的学科知识的普及读物,《考古学是什么》则是收入俞先生与“考古学是什么”相关论文和谈话的文集,立意于学科知识的提高而不是普及。《考古何为》一书的“考古学文献”“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用考古”等是《考古学是什么》没收录的内容,“考古学理论结构”“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等,也不是为了普及学科知识而收录的,《何为》一书是一部普及与提高兼备兼容的著作。

体大思精之体大,不仅是指其编写规模宏大,更在于该书的写作立意于告诉读者“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致“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对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时代要求。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考古人给出准确的诠释。近代意义的考古学是一外来“物种”,《何为》开篇便重申李济、苏秉琦、夏鼐等前辈关于考古学不是金石学发展来的认识。读者从该书8.4“闻见”郑振铎、夏鼐、苏秉琦、张忠培杂目中,可以感受到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为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付出的艰辛,可以了解到根植于中国黄土的考古学成长历程。读者从该书8.1-8.3“读书”“考察”“教学”节目中,也可以感受到陈雍先生这代学者为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付出的努力。何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该书5.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提到俞伟超、张忠培两先生在《探索与追求》一文中总结的五个特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后还要这样走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立意通贯《何为》全书,阅读全书的读者会有这样的感悟。

《何为》关于考古学的精密、深入、独到的见解,每每皆是,不胜枚举。

考古学研究对象——遗存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众多。关于考古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何为》页12讲:“把运用科技手段研究考古遗存与利用考古材料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研究混在一起统称为科技考古,反映出在学科分类方面的混淆不清。”我在《民族考古学是什么》中也曾认为,利用地震学知识,解释房址的倒塌现象,属于考古学,可称“地震考古学”;利用考古材料证明历史上曾发生过地震,应属于地震学,应称“考古地震学”。

不同学科整合研究同一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何为》页111~112认为:依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证实或证伪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是历史学的方法,而不是考古学的方法。陈直先生用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

印、货币、石刻以证《史记》《汉书》,虽较出土文献多出古代器物,但仍是二重证据法;宿白先生运用《营造法式》和《地理新书》等历史文献,解释白沙宋墓的壁画内容、仿木构造、墓地布局等不是二重证据法。我个人的理解,能够想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我们要揣摩王国维、陈直、宿白等大先生的具体研究,从中学到真经。至于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则涉嫌炒作,多学科的整合研究而已。

考古学的生命活力在于田野考古学,吉林大学考古学田野考古能力为国内同行所称道。陈雍先生、许伟先生、张文军先生是继张忠培先生、林云先生、匡瑜先生后的吉林大学第二代田野考古教师,我们这代人挖探方、清遗迹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在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的实践中遇到过众多的疑难现象,《何为》“田野考古学”章之2.2.2条目以图示的形式列举4例饶有趣味的“非典型实例”。案例1,图一位于③层和④层之间的M10有问题吗?

这让我们想起当年太谷白燕遗址发掘时,在探方壁上划出一块类于M10这样的土。无论是谁看,无论是什么时辰看,都认为没有划错。时值黄景略先生在工地考察,他蹲在探方中苦想了两天后突然站起,口中念道:“我看是门”,提着手铲对着探方壁就哐、哐、哐地捣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座窑洞式房屋的门口,神奇!除窑洞式房屋外,偏洞墓、袋形穴等都可以这样表现在探方壁上。

案例4,图二M2打破M1、M2墓主脚部一隔,失一足,M1墓主头部一足,两者可以拼对在一起,这件器物应归属哪一墓?其实这是《宝鸡北首岭》的77M9和77M4的实例,报告按常规将器物归属早期单位。其实,这是一例田野操作失误造成的错误认识,器物应属于晚期单位。由于晚期单位77M9没有清理到墓底,而将鼎足遗落在早期单位77M4中,我在《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中,举例龟山二号墓,报告认为墓主是节王刘纯,但报告刚发表,又清出一枚龟钮银印,为襄王刘注,印章太重落在墓底的淤泥中。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何为》扉页题词:献给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事件是1921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发掘洹池仰韶村遗址。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史上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安阳后冈遗址后,学界认识到安特生发掘方法的不科学性,同时也认识到他所主张的中国原始文化西来的说法的不正确性,对其批评多于肯定。1980年代以后,学界多讲仰韶村遗址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开山意义,肯定多于批评。《何为》在谈到仰韶村遗址发掘时,首先讲到安特生发掘时只到过几次现场,日常发掘和测量是袁复礼主持和操作的,接着转引梁思永先生、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对安特生的批评。最后总结“安特生用地质学的方法发掘仰韶遗址,用人类学的方法命名,解释‘仰韶文化’,用‘文化西来说’推定其来源,在他的发掘与研究里,没有考古学方法论是非常明显的,当是不成熟的田野考古学。”

陈雍先生曾出版两部考古学专著,一部《考古杂俎》,是他退休前自选的积四十年的考古学论文集,可谓“雅”;一部《说说考古》,是他为天津《今晚报》撰写的百篇考古随笔,可谓“俗”。《何为》则兼具两者,雅俗共赏。

《何为》有一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缜密的逻辑阐述与易懂的实例演示相结合,这是最利于读者领会和接受的著作方式。对于无尽无休的炒作概念的文章和著作,我们有着切肤之痛。20世纪末,黑龙江考古所从事三江平原聚落考古时,只能看到介绍聚落考古概念

的文字,并不了解此方法开创者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的操作(陈淳先生组织翻译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出版于2018年)。为此,我专门约陈雍先生到赤峰考察有美国学者参加的聚落考古实践。论述考古阐释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章,每一部分都是这种方法写作的。4.1.2“考古学文化分类”举例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4.2.2“社会结构”举例陈雍《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姜寨聚落再检讨》《半坡文化彩陶的鱼纹分类系统》、陈畅《大南沟墓地的社会组织与性别考古学研究》,等等。

《何为》“考古学文献”章主要是依据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生研究生讲课的讲义改写的。“田野考古学”章主要是依据为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讲课的讲义改写的。这两部分学员都是具备一定程度考古学知识和有了一定田野考古训练,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人。该书兼具提高与普及,更适合考古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程度的读者,我曾将该书发在微信中的一些内容转发到我的研究生群内,收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何为》的一些内容,成书之前曾在陈先生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布,引得圈内的讨论。成书时陈先生又把相关内容收进书中,这又成为本书的一个亮点。我的《旧事新忆》也曾尝试这种写作方式,链接讨论的内容对于著作有着类似注释的作用,帮助理解作者的想法;录入微信圈的链接,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相信这种由新媒体导致的写作形式会为更多的作者接受,成为一种新的著作体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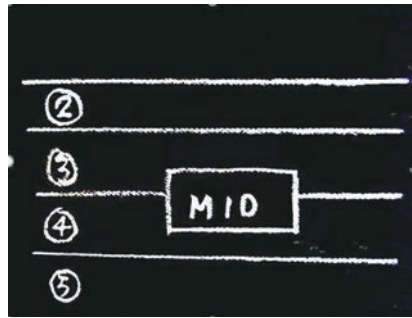
《考古何为》

作者:陈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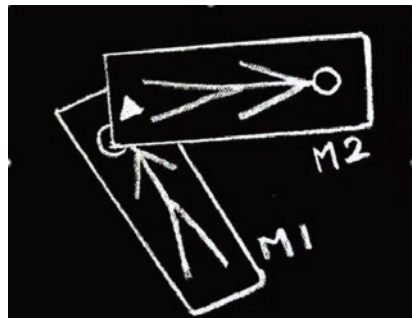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定价:98元



图一



图二

深刻又生动的考古公开课

——陈雍先生新著《考古何为》

穆森

从《说说考古》到《考古何为》,陈雍先生一直在探索用更散文化的文体讲述考古学,让考古学走进大众视野和社会生活中。如果说《说说考古》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那《考古何为》则是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

《考古何为》就像是一堂深刻又生动的考古公开课,大量融入朋友圈的形式和内容,在互动中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张力和亲和力。作者坦言:“我喜欢微信朋友圈里讨论的氛围,仿佛找到在学校那种感觉。”我把微信朋友圈的对话和评论写出来,还有一层意思:想让读者看到考古者是怎样用考古学的话语来讨论考古学问题的。我认为,只有了解考古学的话语,才能更好地了解考古学的知识。

与《说说考古》相比,《考古何为》更体系化和系统化。陈雍先生以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学研究与实践为切入点,在书中完整回答了“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围绕于此,他还从教学、管理、研究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讨论,使得本书的内容和视野十分丰富且广阔。

谢辰生先生曾明确指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是文物保护的一种特殊手段。”《考古何为》正是在用文物保护的视角审视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推进文物保护,很好地诠释了文物保护研究与文物“活起来”之间的逻辑关系。考古学是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类型,本书第7章“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开宗明义:“考古者不仅发现与研究考古遗产,而且保护考古遗产,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者的历史责任。”作者分析了国际理念、国内实际情况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与大众传媒热点问题,提出“以保护考古遗产为目的的公共考古,主要包括考古遗产教育、考古遗产展示、考古遗产传播。”

在这方面,《考古何为》是从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

基本国策的高度来立论着笔的。作者从考古遗产谈起,却不局限于考古遗产,而是立足于《文物保护法》的大框架,以历史文化名城、乡土建筑这样的整体性保护入手,将考古置于文物保护,将单体保护置于整体保护的视野之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要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作者在书中提出三点建议:细化名城、名镇、名村评价标准,制定《价值评估管理办法》;建立监测巡视机制,制定《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实行国家、地方分级巡视管理;建立名城市长联席会议制。作者从陈志华教授开创的中国乡土建筑理论体系中汲取养分,主张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乡土建筑,用乡土建筑的理论方法和保护理念研究城市中的聚落、社区和城市考古、乡土墓葬等,以此反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整体保护。

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基本国策,需要文化遗产教育来支撑。作者以亲身参与的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小学“文化遗产课堂”的实践探索为案例,系统阐述了文化遗产教育应作为终身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区别于以往的文化遗产进课堂和博物馆开展的社会教育,“文化遗产课堂”强调遵循教育规律,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作用,通过建立课程标准,培养师资力量,完成教材编写等工作,开展以学校和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活动。关于文化遗产教育的构成,作者将其概括为: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文化遗产的思想道德教育、文化遗产的法制教育三个方面。进而提炼出七个关键词,即文化遗产、知识、技能、价值、审美、道德、法制观。作者认为,四观教育比知识技能教育更加重要,只有抓住四观教育,才能抓住文化遗产的核心。

《考古何为》还是一部有乡愁情怀的著作,对天津

考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记述和思考,有历史的回响,有现实的追问,或娓娓道来,或拍案而起,归根结底是深情地守望。作者用“一三五”四个数概括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特征:一个人地关系的大规律,考古遗存分布从山到海纵横十万年;三个时段的大历史,10万年以来天津先民适应环境的人文历史,千年以来天津城市的形成发展历史,百年以来天津城市近代化和天津人民斗争的历史;五个层级的古代城市体系,按人口数量和地理单元相关性明清天津城市分为小村、村庄、乡镇、城镇、县城。三元结构的近代城市,中国传统城区与外国租界区、河北新区共存的格局。同时,作者还把大运河作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动脉,强调要把天津的历史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纳入整体保护中,开展必要的修复工作。

书中的“马家店遗址发现与保护的艰难历程”“王家大院历史建筑与王氏家族聚居形态”,在实践层面是推动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程的典型案例,在研究和认识层面则是提供了一种科学范式。如果说前两者是论文的话,那“不要损害盘山的历史真实性”“天津有个‘装王府’”“新建的金汤桥还是文物吗”更像是围绕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杂文。文物很重要,城市不能重来,这些案例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单体,对此,我们岂能熟视无睹?

《考古何为》在书写方式上的创新,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敞开式的结构与叙述,展现出接受美学在专业普及中的重要作用。书中不是简单引用朋友圈的内容,而是在与朋友圈中的人和被研究者进行田野考察式的交流。这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识的考古学通识著作,是在用优质阅读来引领阅读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修复与技术研究基金管委会)

砖瓦年代学的奠基之作

——评《山西文物建筑砖瓦材料调查与研究》

刘勇



几十年来,古建修缮和保护,古建文化的传承传播,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文物大省山西近年来在古建修缮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随着工作深入,在木构之外,过去一直不为人重视的砖瓦开始被研究者关注。数年来,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专家王春波先生带领的团队,开展了山西砖瓦领域的研究拓荒工作。这本书就是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完成的。目前为我国针对文物建筑砖瓦材料领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可以称为砖瓦年代学的开山之作。

全书分七章三附录以及图版。第一章是研究史和研究内容,重点在样本的采集和检测,同时逐步建立砖瓦材料的数据库。这也是砖瓦研究的基础。

第二章是历史上的砖瓦制作工艺综述,结合《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的有关记载,研究了山西历代砖瓦制作基本特点。

第三章是现代山西制作砖瓦工艺调研。选取运城和忻州两个传统工艺制作砖瓦样本,然后又调研了以梭式窑和隧道窑为代表的现代窑制作工艺。比较之下,作者认为目前传统砖瓦做法工艺流程仍为采土、闷泥、练泥、制坯,与古代《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的描述基本相符,一脉相承。但为提高效率和产量而简化或省略了闷泥与练泥过程,这样的复制砖瓦耐久度不如古砖瓦。

第四章介绍样本采集成果。此处记录采集样本砖瓦512件,来自山西文物建筑储存丰富的十个地市,但缺文物建筑储存量较低的阳泉市标本,是个遗憾。

第五章是砖瓦制作工艺演变研究。在第一节里研究认为条砖样本尺寸与《营造法式》制度类似,长宽比为2:1,宽厚比为3:1,基本延续到现在,元之前的砖一般较薄。第二节讨论瓦样本制作工艺特征。谈到瓦凹面布纹存在于多个时代,这样看,这一特征的时代性就不够明显了。第三节讨论砖瓦制作工艺的外观特征,包括绳纹砖、粗线条砖、几何纹砖、手印砖、手印印砖等。作者认为手印砖上的手印是工匠标识或一种操作习惯动作,起源于唐,流行于金、明时期。第四节小结,作者比较后认为现代市上的砖瓦保存部分传统工艺,大规模生产,有些突出问题应该改进,如色泽、密度、尺寸的控制。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认真地研究和认知,尽快推广到古建修缮行业当中。我在山西访问古建时,多次看到旧砖瓦被成批地地废弃。其中一个可能就是新砖瓦的尺寸和传统制作标准不符。

第六章是古砖瓦物理性能分析,发布实验数据。数据表明古砖瓦的外观和抗冻、抗渗、力学等指标均不明显逊色于现代砖瓦,一些数据还明显高于现代标准。

第七章是仿制砖瓦性能分析。从数据小结可以看出,仿制砖瓦在性能上与古砖瓦性能大体相当。但晋南隧道窑制砖瓦指标要低于梭式窑和古砖瓦。

正文后三个数据附表可作为古建修缮行业,特别是砖瓦行业的重要参考。特别是第一个样本信息表,把512件样本信息做了汇总发布,是山西古砖瓦研究的基本数据。图版部分展出样本图和基本信息,更便于读者文图对照了解古砖瓦特征。这部分图版70多页的内容,是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的,但数量太多,应编制一个索引,方便读者按照时代、地点、尺寸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

作为一个纯文科背景的人,我对砖瓦的认识是粗浅的,多年来在山西各地看到很多古砖瓦或千百年来仍忠实履行自己的建筑重要参考。或被现代遗忘,或被现代遗忘。我知道绳纹砖一定是早的,但其粗细、疏密却与时代密不可分。这本书的研究数据,是文物建筑保护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第一部有理论和数据支撑的为砖瓦业写的书。砖瓦是基础建材,之前一直少人问津。而今,大量的文物建筑保护和仿古建筑,都急需这样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研究著作。本书作为砖瓦之学的现代开山之作,意图初步建立起山西文物建筑砖瓦材料的年代学谱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书会成为砖瓦年代学的奠基石,让行业 and 后人受益。为今后的文物建筑修缮,对补配青砖、青瓦的使用要求提供较为科学的参考。

在关注古建木构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如果说木构是古建的骨骼,那么历代的砖瓦就是古建的血肉。这样看,这本理科技术派的著作,也将成为多学科视野下古建文化更新过程中的里程碑。希望本书作者团队建立的古砖瓦数据库能继续丰富下去,不断完善。社会各界的古建爱好者会由此开始关注作为古建组成部分的古砖瓦,这也是一项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遗产。

《山西文物建筑砖瓦材料调查与研究》

著者: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砖瓦课题组

出版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定价:268元

